

目 錄 Contents

❖ 時事論壇 ❖

- 溫家寶總理訪韓的兩個選擇與和諧 [韓國] 李國峰 33

❖ 研究述評 ❖

- 近代中國留學史研究概況 周佳榮 35
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兼評《大清留美幼童記》 丁 潔 38

❖ 研究述評 ❖

- 《東方雜誌》的重要性及其文化意義 范永聰 42
制度與福利的配合——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員工規則初探 區志堅 48

❖ 書 評 ❖

- [法] 戴仁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 甘穎軒 52
鍾寶賢著《香港影視業百年》（修訂版） 黃曉恩 54

❖ 書刊介紹 ❖

- 浸大歷史系同人近刊新書介紹 資料室 56
朱益宜博士研究瑪利諾修女的三本專書 資料室 58

❖ 學界動向 ❖

- 浸大歷史系活動匯報（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 資料室 60
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紀念活動 資料室 63
學界消息簡報 資料室 64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Communities,
Immigration, and Influence in Modern Asia Michael Wing-hin Kam 66
-

* 本期封面：美國紐約州瑪利諾神父修院（攝於2001年夏天），
照片由朱益宜博士提供，謹此致謝。

❖ 時事論壇 ❖

溫家寶總理訪韓的兩個選擇與和諧

[韓國] 李國峰

2007年4月10日至1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了韓國。此次溫家寶總理訪韓，是為紀念韓中建交15周年和“中韓交流年”而進行的正式訪問。中國國務院總理的這次韓國之行，是繼2000年朱鎔基總理訪韓後7年的首次訪問，同時也是2003年溫家寶當選中國國務院總理以後第一次到韓國的訪問。因此，此次訪問頗有歷史性的意義。

關於溫家寶總理訪韓的歷史性意義，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第一次訪韓的溫家寶總理在韓國下飛機後，首先去的地方是位於京畿道益唐的SK電訊Access研究院。二是，政府有關人士認為，北朝鮮不履行由於六者會談而得出的2.13合意，因而他們預測溫家寶總理此次訪韓的重點是北核問題，但是，事實上溫家寶總理此行關注的重點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中韓FTA）這一經濟問題。

在這裏，我們需要分析溫家寶總理選擇SK電訊Access研究院和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問題的內涵。據韓聯社報導，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一站SK電訊Access研究院參加了TD-SCDMA（時分同步碼分多址接入）測試平臺開通儀式，而且他與中國資訊產業部部長王旭東通過TD-SCDMA進行了約5分鐘的視頻通話。溫家寶與王旭東都大力稱讚這項技術，同時強調TD-SCDMA是兩國合作的象徵。

據悉，TD-SCDMA是中國政府促成的、中國獨自開發的第3時代移動通信技術，它是與半導體、手機一樣，中國國家成長產業指定的戰略技術之一。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溫家寶總理為什麼對韓國第一次訪問的首站選擇的是SK電訊Access研究院。中國的技術通過與韓國合作展現出中國“自主創新”的可能性，這一事實證明中韓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及兩國互相幫助的必要性。

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出，溫家寶總理關注的重點不是北核問題，而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問題的理由。在韓國看來，近年美國在韓半島的影響力不斷下降。雖然韓國和美國是傳統的友邦，而且是軍事同盟，但是，現在韓國和北朝鮮已從冷戰到了傾向於和平的關係。因此，美軍在韓半島的必要性比以前減少了。

這樣的情況下，中韓兩國建交了，兩國由於地理相鄰、交通便捷、文化認同、先進技術與廣大市場等互補性因素而導致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不過，溫家寶總理10日來韓訪問之前，韓美兩國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主要包括美國通過與韓國的新經濟同盟關係（韓美FTA），而不是軍事同盟關係保持美國在東北亞地區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影響力。這有可

能會影響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對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在中國看來，不管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方面，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介入，都不值得高興。因此，中國希望早點與韓國達成 FTA,使美國對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相對縮小。中國期待著中韓 FTA 使中韓兩國經濟關係更鞏固，而且使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增強。由此可見，溫家寶總理此行的重點不是北核問題，而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是非常明智的。

總之，韓國爲了獨自生存，絕對不可能放棄廣大的中國市場。中國也不可能忽視地理上的戰略要地韓半島。因此，韓國獨自生存的空間與中國在東北亞地區影響力沒有矛盾接觸的關鍵就是“和諧”。這是爲了兩國利益最大化的無可置疑的最佳選擇答案。當然，和諧是不能自然而然得到的東西，首先要瞭解對方，然後要尊重對方，只有通過這樣的態度及過程才能達到完美的和諧。通過中國與韓國 SK 電訊合作的 TD-SCDMA、溫家寶總理到韓國下飛機後首先訪問韓國 SK 電訊 Access 研究院的事實，我們已經看到了“和諧”的端倪。(2007 年 4 月 25 日)

【作者簡介】李國峰，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 研究述評 ❖

近代中國留學史研究概況

周佳榮

一、草創期：1960年代以前的先驅著作

中國近百餘年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現代化的路途是非常崎嶇和曲折的，萬千先賢在艱苦境況下探索求進，甚至不惜遠涉重洋，學習外國的新知識，吸收時代的新思想，為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尋找出路。他們有些前往西方歐美諸國，有些東渡日本，掀起了一波一波的留學潮流，從而孕育出一個不斷壯大起來的新知識群體。

舒新城著《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是探討中國人出洋留學的先驅著作。書中已予指出：“留學生在中國文化上既有如此重大的影響，我們研究近代中國文化，可不注意其淵源之留學史嗎？”其後，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1960年初版，1970年增訂），對留日學生資料搜羅甚豐，此書由譚汝謙、林啓彥合譯為中文，198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1983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印行簡體字版，成為這方面的奠基之作。

石錦著《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年），以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為背景，探討清末留日學生對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貢獻，是留學史研究專題化的少數先例。

二、開拓期：1970年代及1980年代的研究

近代中國留學生問題受到研究者注意，始於1970年代。重要的著作有瞿立鶴著《清末留學教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林子勛著《中國留學教育史》（台北：華岡出版公司，1976年）及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等，反映了台灣學界對留學教育的重視。

1980年代起，研究題材較前深化，香港學者李志剛著《容闈與中國近代化》（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海外學人高宗魯著《中國幼童留美史》（台北：華欣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還有台灣學者陳瓊瑩著《清季留學政策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等，可為代表。中國內地學者也開始對留學史加以注意，除了張允侯、殷敘彝、李峻晨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是專題著述外，穎之編著《中國近代留學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董守義著《清代留學生運動》（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喜所著《近代中國的留學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都是較全面地探討留學史的概論書。

三、發展期：1990 年代的研究成果

踏入 1990 年代，又出現了幾種關於留學史的著作。首先可舉的，是王奇生著《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繼留學生叢書編委會編《中國留學史萃》（台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 年）之後，有周棉主編《留學生與中國的社會發展》（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97 年），兩書均為論文結集，在個別問題上漸見深度。孫石月著《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 年），比較全面地敘述了近代中國女性出國留學的情形；沈成殿主編《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上、下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在資料和內容方面都有可觀。值得注意的是周棉主編的《中國留學生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這冊大型工具書為近代中國留學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

李喜所著《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年）是 1992 年出版舊著的重版，包括〈早期留學生與中外文化的初步接觸〉、〈留日熱和資產階級文化的廣泛傳播〉、〈留美高潮與科學、民主思潮〉、〈留法勤工儉學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勃興〉四章，比較全面地討論了留學生與中外文化的關係，尤其是中西文化如何對接。著者在〈重版自序〉中指出：「從洋務運動時期留美幼童的派遣到改革開放以來留學大潮的湧現，留學生已經成長為中國新知識群體當中融合中外文化最活躍的一支力量。換言之，留學生為中西文化的對接提供了人才資源。有了經濟和社會的基點，有了承載新文化的新人才，中西文化的對接點就找到了。」這就是本書總體的撰寫理念。

紐約天外出版社於 1999 年刊行一套由李又寧主編的「華族留美史研究會叢書」，使留學史研究增色不少。當中《留美八十年》（一、二），共收文章二十多篇，記述了 1920 年代至 1990 年代各自的留美經驗；《當代留美中學生：喜樂與辛酸》收錄六十多篇文章，作者是一群分別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十餘歲華族青少年，表白了他們的親身經歷、思想感情、志趣和希望，或者可以視為另一本「留美幼童史」。《華族留美史：150 年的學習與成就》則是 1997 年在紐約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除了李又寧所撰的〈導言〉外，張玉法〈留美歸國學生與中國領導階層（1846-1949）〉、高宗魯〈容閔與留美幼童〉及江勇振〈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留美學生〉三篇探討近代中國的留美學生，其餘九篇集中論述留美學生與台灣發展的關係。

四、成熟期：2000 年以來的新著

2000 年以來出版的新著，在專和通兩方面都有可觀。安寧、周棉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交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是一冊論文集，武繼平著：《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年）專研郭沫若留學日本的生涯，錢鋼、胡勁草著《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2003 年）使留美幼童史面目一新，尙小明著《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論述留日學生對清末政治的影響。至此，近代中國留學生和留學史已是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要進一步深入和擴展，就要為分散於海內外的研究者締造聚首一堂、共同切磋的機會。

2003 年 10 月，徐州師範大學發起主辦全國性的“留學生與中國的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同年 12 月，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大量文物資料，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一個近代中國

留學生展；《學海無涯——近代中國留學生展》（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3年）便是根據展覽內容結集而成的圖冊。上述機構又與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作，共同主辦“近代中國留學生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逾五十篇，成果豐碩。研討會以近代中國留學生為主題，回顧了百多年來中國人到海外留學的歷史，也討論到現時仍然浩浩蕩蕩的留學潮流，並且展望今後的趨向。

劉中國、黃曉東著《近代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閔》（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重新論述容閔作為近代中國最早留學生的經歷以及他對留美幼童運動的貢獻。

程新國著《庚款留學百年》（上海：東方文化中心，2005年）分「庚款興學」、「美雨歐風」、「再造中國」三部分，探索近代中國庚款留學的起源及這批庚款留學生負笈歐美的歷程和他們的成就；葉雋著《另一種西學——中國現代留德學人及其對德國文化的接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則從中德文化交流的視野，探討馬君武、宗白華、陳銓、馮至等學人與德國文化的淵源。劉曉琴著《中國近代留英教育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是首部系統論述留英學生經歷的學術著作，鮮于浩、田永秀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的四川青年》（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則反映了有關方面的探討逐漸深化。

李喜所主編、周棉副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收錄論文五十餘篇，內容宏富，反映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此書所選論文大致包括以下七個方面：一、從總體上考察留學生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二、分區域或單位來論述留學生的特徵；三、具體論述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留學生；四、分國別專門論述留美生、留日生、留俄生和留法生；五、探討留學生與中國現代學科發展的內在聯繫；六、留學生各類代表人物的研究；七、研究現狀綜述。

丁新豹、周佳榮、黃嫣梨主編《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6年）所收論文，除李又寧、高宗魯、章開沅三位特邀學者的演講作為序論外，分為六項：一、近代留學運動；二、留學生政策；三、軍事與外交；四、社會與經濟；五、教育與思想；六、學術與科技。前赴英、美、德、法等西方國家和東方日本的留學生均見論及，為數較少的女子留學生亦有數篇專論。上述兩種新近出版的論文集取材和重點均有所不同，可以互相補足；亦可肯定地說，在相當程度上總結了上個世紀有關中國留學生問題的研究，同時也是一個新的起點，宣告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正在展開。鄭宏泰、周振威著《香港大老——周壽臣》（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傳主周壽臣就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書中公開了不少珍貴的家族史料，有助於更具體地探討晚清留美幼童這段歷史和相關人物的事蹟。個別留學生的專題研究，相信是今後主要方向之一。

後記：去年為《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寫序時，就學界研究近代中國留學生的概況略作回顧，其後加以補充而成此文，供有興趣者進一步參考。2007年6月12日

【作者簡介】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 研究述評 ❖

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 兼評《大清留美幼童記》

丁 潔

(一)

“留美幼童”是指 1872 年至 1875 年清政府先後分四批派出的 120 名赴美的官費留學生，他們是中國第一代官費留學生。之所以稱其為幼童，是因為這些留美學生在赴美之時，年紀大多在 10—15 歲之間，平均年齡只有 12 歲半。留美幼童的出現源於清政府訂立的一個長達 15 年的留學計劃。該計劃是在各省挑選優秀的幼童，每年 30 名，四年共 120 名，派出出洋，赴美留學，學習西方的語言、地理、數學、天文、製造、軍事等先進技術。15 年後，按年分批回國。歸國之時，幼童當正值 30 歲上下，年方力強，聽候總理衙門量才使用，可報效朝廷。但當這一計劃進行到第十年的時候，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而半途夭折，功虧一簣。這些幼童被召回後，一部分人參加了 1884 年的中法海戰、1894 年的中日海戰，其中一些幼童陣亡殉國；一部分人成為中國鐵路、電報以及採礦業的創始人；一部分人投身商界，還有一部分人在政治、外交方面發揮著自己的長才，其中甚至出現了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理。可以說，這些幼童目睹經歷了晚清至民初的所有重大事件，是這段雲詭波譎的歷史的見證人。

錢剛、胡勁章著《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2003 年)一書就講述了這批幼童的故事，從留學計劃的形成到幼童赴美及他們在美國學習生活的情況，再到他們被召回的前後事由，還描述了他們在歸國後不同的遭遇和命運。

幼童留美計劃的訂立源自一個人，他就是容閔。容閔生於 1828 年，他的家鄉在廣東珠海，與澳門只有一水之隔。他在 7 歲就去了澳門的西塾讀書，後來又在香港的馬禮遜學校學習。18 歲那年，容閔跟隨布朗牧師赴美讀書，同行的中國學生還有黃寬和黃勝兩人。在美國，容閔先在麻省的孟松學校學習，畢業後，於 1850 年進入耶魯大學，隨後在 1854 年順利畢業，成為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著名大學的中國人。而在耶魯讀書之時，容閔已在心中醞釀中國的留學計劃。可是他回國後，卻過了一段相當苦悶失意的生活，沒有機會實現他遠大的計劃，直至他遇見了曾國藩。1863 年，曾國藩正著手建立西式機器廠，委任容閔出洋購買機器。當時，朝廷中的恭親王奕訢、大臣文祥，地方大員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立意改革，這場改革被後人稱為“洋務運動”。洋務派建立了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以引進西學，但成效不大。1868 年，美國人蒲安臣作為中國委任的第一任出使歐美使臣，代表中國與美國簽定了《蒲安臣條約》，正是這一條約為清政府日後向美國派遣幼童留學奠定了法律基礎。容閔自出洋購買機器

歸來後，仍沒有機會實現其留學機會，而“天津教案”的發生帶來了一個契機。1870年春，天津發生暴動，民眾殺死法國天主教徒，焚毀教堂和醫院，曾國藩和丁日昌被緊急派往天津，處理中法危機。這件事使得“外交”和“自強”變得更加重要和緊迫。這正是容閔留學計劃提出的最好時機。1871年8月5日，曾國藩和李鴻章聯名遞交奏摺，奏請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同年9月9日，終於獲得了批准辦理的聖旨。

(二)

首批“留美幼童”於1872年8月11日乘坐輪船起程赴美，9月14日到達舊金山市。初到新大陸，放眼所及的一切，對幼童們而言都那麼新奇有趣；而舊金山市的民眾也對這些由最古老的國度來到這最年輕的國家的少年們充滿了好奇。接著，幼童們乘坐火車，橫穿大陸，來到美國東部新英格蘭地區的春田小鎮。在這裏，幼童們三五一組，被分散到沿著康涅狄格河谷居住的美國人家中。他們吃住在這些家庭中，既可以感受到家庭的關懷，又能儘快地學習語言。中國留學事務局大樓也建在了康州首府哈特福德，翰林陳蘭彬任留學事務局委員，容閔任副委員。分散居住在各處的幼童，會被定期安排回哈特福德，在留學事務局學習中國功課。這些幼童在美國生活、學習、社交等方方面面都逐漸融入了這個新興國家。在寄宿的家庭，他們與家庭成員相處融洽，形同家人；在學校，他們成績優異，甚至在藝術體育方面也有出色表現；在社交場合，他們是受歡迎的一群人，舉止優雅得體，態度溫文有禮，神秘的東方氣質，更爲他們加分。幼童在美留學的這段時間，正是美國飛速發展一段時期。幼童們親身經歷了電話機、留聲機的發明；參觀了美國百年紀念世博會；與文學巨匠馬克·吐溫及斯陀夫人結交；受到南北戰爭的英雄，格蘭特總統的接見……。

幼童們在美國的學習生活如此豐富多彩，如魚得水，留學事務局的官員們卻不見得贊同。他們時常擔心幼童們“中學荒疏”的問題，又認爲幼童不應涉獵過寬，應專注學習國家需要的技能。好在留學事務局的職權大部分時間掌握在容閔手中，因此幼童的生活學習尚未受到太大的拘束。但自吳子登被任命爲留學事務局的第四任監督開始，情況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吳子登一到任，就時時批評留學事務局過去的規定，擺開整肅的架式，訓示幼童，要他們溫習“四書”；要求幼童停止學習美國地理、詩歌、鋼琴等課程，禁止他們旅行。除此之外，吳子登還對留學事務局的一切吹毛求疵，將種種詆毀幼童的傳言傳回國內。而此時國內的情形也有了變化。首先美國西海岸出現了“排華”浪潮，中美關係陷入低潮；另一方面又有御史指責有幼童入了基督教；而美國則未曾履行承諾，未能使幼童進入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這也使得李鴻章開始質疑留學事務局是否應該繼續存在。更有陳蘭彬和吳子登屢次提議，要求裁撤留學事務局，召回幼童。雖然容閔做了種種努力，卻無法力挽狂瀾。1881年6月8日，上諭下旨，召回所有出洋學生。被召回時，大多數幼童尚未完成大學學業。已經從大學畢業的只有就讀耶魯大學雪菲爾德學院的詹天佑和歐陽庚，仍然在美國東部各大專院校就讀的至少有50人，其餘仍在高中。留學計畫的夭折使得幼童們不得不終止學業，離開美國，甚爲可惜，因此幾乎所有幼童都是極爲不願意的，無奈迫於形勢，不得不踏上歸程。其中有兩名幼童在被召回途中脫逃，一是譚耀勳，他留在美國，後於1883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但當年秋天就不幸病逝；另一個是容閔的侄子容揆，他188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之後長期供職於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除去病逝於美國、因故提前遣回以及上述二人之外，被召回的幼童共94名，分三批於8月8日、23日及9月27日啓程歸華。

幼童們回華後，並沒有得到當初清政府所承諾的良好待遇，而是受到了歧視和冷待。他們自登岸起，就受到監視，沒有專人接待，還被禁閉於上海道台衙門後的“求知書院”。好在歸國幼童中的 70 人被李鴻章接收到了北洋，並被安排到招商局大樓居住，這才得到較好的照顧。隨後，一批幼童被分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其中 6 人參加了 1884 年的馬尾海戰，4 人陣亡。另有一批幼童被分配到天津電報學堂，與電報事業終身為伴，成為電報業的開山鼻祖和創業英雄。有 7 名幼童被分配到開平礦務局的路礦學堂，日後成為中國礦業的創始人。隨著礦業的發展，對鐵路的需求也日益緊迫，包括詹天佑在內的一批幼童就投身於中國的鐵路業。

(三)

在清政府派送幼童留美的同一時期，日本也派遣了大量的留學生出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政治體制，但在這方面，日本比中國更為積極和徹底。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日兩國在海軍實力方面展開競爭，競相採購先進軍艦，培育新式的海軍軍官。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戰成為驗證雙方實力的舞臺。在這場大戰中，雙方幾乎所有的高級指揮官和艦長都是留學生，因此這場戰爭儼然是場留學生大戰。最終卻是北洋艦隊全軍覆滅，中國慘敗。共有 11 名“留美幼童”參加了這次的海戰，其中三人陣亡殉國。“幼童”林聯輝是李鴻章的醫官，“幼童”吳應科則是李鴻章晚年的幕僚，他們目睹了李鴻章在晚年於無奈中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清政府在此時已逐漸走向末路。

曾就讀耶魯大學的容星橋是“留美幼童”中唯一參加革命的人，他是容閔的族弟。容閔在參與維新被迫流亡後，正是由於容星橋的牽線，才認識了孫中山、梁啟超等人。“戊戌變法”失敗後，1900 年的“庚子事變”使得慈禧等人不得不考慮實行新政以維持岌岌可危的統治。新政廢除了科舉，改變了官員選拔制度，對“留美幼童”影響至深。在實行新政的過程中，袁世凱逐漸掌握實權，他甚為賞識“留美幼童”，唐紹儀、梁敦彥、梁如浩、蔡紹基和周壽臣等人先後受到他的重用。“留美幼童”的命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幼童”梁誠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公使，他赴美時隨員中就有 5 名“留美幼童”，正是由於他的四處奔走，才促成美國同意返還 10,785,286.12 元的“庚子賠款”。這筆賠款被要求用於派遣中國學生留學美國，這就是“庚子留學計劃”的由來。在實行這一計劃的過程中，同樣是“留美幼童”的外務部主事唐國安擔任幫辦參與選派學生赴美。為培養合格的學生留美，清政府在清華園設立“清華學堂”訓練學生。學堂後更名為“清華學校”，唐國安任校長，從而成為清華大學草創時期的校長。清政府雖然實行了新政，卻仍然無法阻擋頹敗的趨勢和革命的腳步。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革命的力量開始撼動清廷的根基，南方革命軍與清軍在漢口和武昌隔江對峙。1911 年 12 月，作為袁世凱身邊親信大臣的唐紹儀代表北方清政府，與南方革命黨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談判。正是這兩個人促成了“南北議和”。1912 年，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唐紹儀成為中華民國的首位總理。至此，“留美幼童”登上了在歷史舞臺上的巔峰。

(四)

近年來，“留美幼童”的歷史成為學者關注的熱點，關於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海外學者高宗魯譯注的《中國幼童留美史》（[美]拉法吉著）和《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容閔的自傳《西學東漸記》和“幼童”李恩富的自傳《我在中國的童年故事》等也提供了相當珍貴的資

料，其他的著作論文還有石寬所著《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李志剛著《容閔與中國近代化》，以及凌鴻勳和高宗魯著的《詹天佑與中國鐵路》、《唐紹儀與清末民國政府》等；論文有美國學者羅賓所寫的〈架橋——中國留學事務局在美國：1872—1881〉、高宗魯〈容閔（1828—1912年）與中國幼童留美（1872—1881年）〉容應莢〈1870年代“留美幼童”與1900年代留日學生的比較〉等。

上述著作大多是“留美幼童”歷史的學術性研究，文字嚴謹，資料詳實，但有時難免不夠生動，缺乏趣味。而這本《大清留美幼童記》在根據資料還原歷史的同時，亦運用優美的語言，豐富的圖片使得“留美幼童”從枯燥的文字和資料中跳脫出來，成爲一個個有著鮮明形象和性格的個體。作者在敘述“留美幼童”這段歷史時，將其交融在大的歷史環境之中，既使我們看到周遭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如何影響了幼童命運遭遇，又讓我們看到幼童是如何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下發揮自身的才能，繼而影響社會歷史的發展。作者在描述幼童個人經歷之時，常常以幼童或相關人士的書信、日記以及回憶錄等代替自己的記述，從而更加生動、直接地展示幼童的生活學習狀況和際遇，清晰表達了幼童於當時的思想情感。作者於描繪這段歷史的同時，也在敘述中插入自己尋找的資料，尋訪見證人的經過，以及見證人的口述歷史等，歷史與現實交替出現，豐富了內容，充實了史料。

不過，看畢全書後亦有感到不足之處，該書在講述幼童歸國後的經歷時，只講到中華民國建立爲止，僅對部分幼童其後的經歷做了簡單介紹。如果可以詳細瞭解幼童們在此之後的遭遇及最終命運，相信對於讀者而言，才是真正爲該書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作者簡介】丁潔，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

❖ 研究札記 ❖

《東方雜誌》的重要性及其文化意義

范永聰

（一）

近代中國的新式刊物與現代化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新式報刊改變了傳統以來知識傳播的方式，除了向讀者傳遞新知識和新思想外，還建立了一個平台，給予知識分子討論國家發展的空間，令各式各樣的言論能藉著報刊與讀者產生互動作用，從而在社會上造成輿論力量，配合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在中國的大城市中，上海可說是現代化的最前線基地。李歐梵指出，自從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地把「現代文明」等同於「西方文明」及把「現代化」等同於「西化」開始，上海無疑是中國創造無數具現代性觀念的「文化產品」的中心。當時上海不單是全國最現代化的大城市，更是一個集中了全國最多報社和出版社的城市。¹ 而在眾多以上海為出版基地的報刊之中，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東方雜誌》是影響力較大的一份。該誌創於1904年3月，至1948年12月停刊為止，歷時四十四年，是近代中國史上壽命最長的大型綜合性學術雜誌。² 前後出版了四十四卷，共有五百多期，累計發表各種文稿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二篇，達一億多字。³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出版界中，《東方雜誌》以其高度嚴肅性、學術性及豐富的內容，贏得社會的推重，更被尊稱為「雜誌界的重鎮」、「雜誌的雜誌」，在廣大讀者心目中享有極崇高的聲望與地位。⁴ 該誌不單只見證了半個世紀的歷史演變，其刊行經過、專欄與專號的出版及文章內容等，著實與近代中國文化發展息息相關。誌上載有大量討論中國文化問題的文章，其中一位主編杜亞泉（1873–1933）曾於1915年至1919年間與陳獨秀（1879–1942）就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展開了著名的「東西文化論戰」，⁵ 故此，透過對該誌的詳細研究，將可

-
- 1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6。
 - 2 黃良吉撰：《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1；並參方漢奇：《〈東方雜誌〉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載方漢奇著：《方漢奇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78。
 - 3 以上數字，是據《東方雜誌總目》所作的統計結果。
 - 4 方漢奇：《〈東方雜誌〉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頁278。
 - 5 有關杜亞泉與陳獨秀「東西文化論戰」之經過，詳見范永聰著：《東方雜誌與近代中國文化的變遷》（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頁148-183。

窺探近代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文化變遷。換句話說，《東方雜誌》本身就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化發展史的珍貴材料。

作為商務印書館創辦的首要雜誌，《東方雜誌》自 1904 年 3 月起，至 1937 年 8 月 13 日「八一三滬戰」爆發為止，一直以上海為其出版基地，這無疑使該誌與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西方文化緊密地連接在一起。⁶《東方雜誌》刊行之初，除介紹國內外時事外，還選刊有關的報章記事和論文。⁷及後該誌實行重大改革，從東、西文報刊取材，譯述世界最新政治、經濟、社會現象和學術、文化思潮等，面貌一新，每期銷量更曾高達六萬份，⁸成為民國時期國內影響力最大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並奠定其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界中的崇高地位。⁹

(二)

《東方雜誌》之所以能夠在清末民初近半個世紀的政治浪潮中屹立不倒，當與其編輯方針有密切關係。總的來說，該誌有兩大編輯方針，即盡量不談政治及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不談政治方面，《東方雜誌》一向於各種政治觀點之間極力保持客觀與中立，盡量達至編輯上的平衡，編輯多數對政治保持中立，除了李聖五有明顯的國民黨背景之外，其餘均為無黨派人士。事實上，該誌在政治方面稱不上是最先進的，但絕對不在政治落後之列。至於兼容並包方面，細心察看整套《東方雜誌》，不難發現在該誌內，持有不同政治傾向及各種學術觀點的論文是並存的，其宗旨為使讀者能從不同觀點的文章中得到各種知識，並擇善而從之。持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在編輯部中一起工作，讓《東方雜誌》成為一份包含各種思想在內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不過，若細心察看其內容，仍不難發現它擁有自己的傾向和側重面。一份成功的雜誌，畢竟有其本身一套出版理念。¹⁰

《東方雜誌》之所以是一份重要的雜誌，除了因為歷史悠久之外，擁有眾多讀者及內容豐富多元，均是其成功原因。1934 年 7 月 16 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四號，有一個名為「讀者作者與編者」的專欄，就該誌的讀者作了統計。據此得知，當時《東方雜誌》的讀者大約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政治家或從事政治工作人士，佔讀者總人數約百分之二十；第二類是大學教授及學生，佔百分之三十；第三類是中學教師及學生，佔百分之二十；

6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 - 1945》，頁 119-120。

7 黃良吉撰：《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頁 6-7；並參 Leo Ou-fan Le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 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34.

8 根據現存的資料所示，在 1910 年代時，《東方雜誌》每期銷量約為 15,000 份；及至 1931 年，該誌每期銷量已升至 20,000 份；到了 1934 年時，每期銷量更到達頂峰的 60,000 份。參閱 Lo Shuk Ying, *Imag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Eastern Miscellany, 1928-1937* (M. 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8), pp. 153-154.

9 黃良吉撰：《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頁 11 - 12。另外，根據 1930 年代時的資料所示，1931 年時全中國最高銷量的雜誌為《生活週刊》（每期售出約 125,000 份），其次為《良友畫報》和《機聯會刊》（每期各售出約 40,000 份），再次則為《東方雜誌》（每期售出約 20,000 份）。詳見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404。

10 方漢奇：〈《東方雜誌》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頁 281-282。

第四類是海外華僑及其他種類的讀者，共佔百分之三十。¹¹ 這項統計數字說明了《東方雜誌》的讀者當中，有一半以上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由於有這樣牢固的讀者基礎，該誌便能更輕易地把其影響力伸展到知識界。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作為一份綜合性學術刊物，《東方雜誌》包羅萬有，刊登了不少關於歷史、哲學、宗教、社會、文化、數學、科技及科學等多個範疇的文章和資訊。這些內容除了適合知識分子閱讀之外，亦能供應社會上普羅大眾對新知識的需求。當然，若《東方雜誌》採取高深的學術性形式，恐怕會令一般教育水平不太高的讀者望而生畏；故此，該誌的文章大多以一種並非純學術性的手法來處理。例如，在一些較嚴肅的文章內加入若干有趣的插圖或漫畫，藉以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¹² 此舉除了增添《東方雜誌》的趣味性外，可以吸引更多普羅大眾成為該誌的讀者，使它能對不同階層的讀者發揮更大影響，從而成為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雜誌之一。

此外，《東方雜誌》一直注意保持刊物的質素，由於擁有一群高水平的撰稿人，該誌在民國時期一直廣受讀者歡迎。雜誌上所刊載的文章多為佳作，很少出現平庸、媚俗的應酬文字。歷任主編之中，孟森（1868–1938）是著名的明清史專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杜亞泉在他所屬的年代，是十分罕見的人文和自然科學兼通的專家；胡愈之（1896–1986）後來擔任過《光明日報》總編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總署署長，是著名的政治運動家和新聞出版家。其餘的主編如李聖五、蘇繼瑛等，均為一方專家。正正由於主持該誌編輯工作的是這樣一批出色的學人，才可使刊物的質素始終保持較高的水平。與此同時，《東方雜誌》所刊的文章亦有不少出自名家手筆。例如政法界有陶孟和（1888–1960）、馮自由（1881–1958）、王造時等；社會學界有費孝通（1910–2005）和潘光旦（1899–1967）等；教育界有蔡元培（1868–1940）等；史學界有王國維（1877–1927）、顧頡剛（1893–1980）、錢穆、周谷城（1898–1996）、丁文江（1887–1936）及岑仲勉（1885–1961）等；哲學界有陳獨秀、胡適（1891–1962）、馮友蘭（1895–1990）、朱光潛（1897–1986）、張君勱（1887–1968）和俞頌華（1893–1947）等；文學界有魯迅（1881–1936）、巴金（1904–2005）、老舍（1899–1966）、茅盾（1896–1981）、葉聖陶（1894–1988）、丁玲（1904–1986）、沈從文（1902–1988）、傅雷（1908–1966）、周作人（1885–1967）及林語堂（1895–1976）等。這些學者的學術觀點各有千秋，政治傾向也不盡相同，但都是一時之選。長時期擁有這樣一批高水平及具備知名度的人士為《東方雜誌》撰稿，自然能使該誌保持高品位和高質量。¹³

早期的《東方雜誌》時常轉載中國各地報刊的文章。當然，這些文章的觀點和立場是與《東方雜誌》較為接近的，足以反映該誌在若干問題上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選錄其他報刊文章的做法，使《東方雜誌》內所見的不只是該誌本身的意見，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輿論界對某個問題的共同看法，從而提高了《東方雜誌》在近代中國報刊界的代表性。

《東方雜誌》在不同時期刊載各類迎合讀者閱讀興趣的文章，因而成為一份既受歡迎而又長壽的刊物。晚清時期，改革的呼聲甚囂塵上，《東方雜誌》刊登大量有關改革傳統中國政治、社會、學術與宗教文化的文章；新文化運動期間，該誌收錄各種討論中國文化發展路向的論文；到了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不少探討中華民族特性、讚揚傳統中國文化的文字出現在

11 李聖五主編：《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四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7月16日），「讀者作者與編者欄」，頁301-302。

12 Lo Shuk Ying, *Imag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Eastern Miscellany, 1928–1937*, p. 30.

13 方漢奇：〈《東方雜誌》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頁282-284。

《東方雜誌》之中。凡此種種，皆證明該誌除了能秉承本身的出版宗旨外，更能迎合讀者閱讀口味的轉變，從而成功建立起報刊界一棵「長青樹」的形象。

(三)

由於《東方雜誌》是商務印書館所創辦的刊物，而它在近代中國報刊史上又享有十分尊崇的地位，故此，在觀察《東方雜誌》的同時，對商務印書館、近代中國報刊發展史和《東方雜誌》這三個範疇的研究概況有所了解，也是相當重要的。整體來說，學界近年對此三者的研究頗為注重，如關於商務印書館歷史的重要著作，由該館編寫的就有多種。¹⁴ 近期出版的研究則有：吳相著《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法]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楊揚著《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家駒著《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等。至於與商務印書館關係甚為密切的張元濟（1867-1959）和王雲五（1888-1979），都各有研究專著出版。¹⁵

近代中國報刊發展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甚為豐碩。通論性著作為數甚多，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是開山之作，至今仍具參考價值；此外，趙君豪著《中國近代之報業》（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及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33) 亦為不可忽略的著作。上述學者於論述近代中國報章與雜誌的發展時，不約而同地指出當時的混亂局面阻撓了出版業的順利發展。這三部著作的另一貢獻，是為近代中國報業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其不足之處，

14 包括《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商務印書館創立三十五年紀念特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商務印書館建館八十周年紀念，1897-1977》（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1977年）、《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1897-1992：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1897-1997》（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商務印書館與廿世紀中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和《商務印書館百年紀念書畫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等。

15 論述張元濟的有：汪家熔編著《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合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王英編著《一代名人張元濟》（濟南：濟南出版社，1992年）；吳方著《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王紹曾著《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張榮華著《張元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周武著《張元濟：書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汪凌著《張元濟：書卷中歲月悠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等。研究王雲五的有：楊亮功等著《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王壽南編著《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四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蔣復璁等著《王雲五先生與近代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郭太風著《王雲五評傳》（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王建輝著《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胡志亮著《王雲五傳》（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徐有守著《王雲五與行政改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和《出版家王雲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等。

就是對於近代中國報刊與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關係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

其後關於近代中國報刊史的著作，探究報業發展的有：袁昶超著《中國報業小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年）、賴光臨著《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臺北：中央日報社，1981年）等；探索新聞事業發展史的有：賴光臨著《中國新聞傳播史》（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李龍牧著《中國新聞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炳炎著《中國新聞史》（臺北：陶氏出版社，1986年）及胡太春著《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近年來，中國內地學界致力於近代中國期刊及圖書事業發展的研究，收獲頗為豐碩，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較有系統地討論近代中國報刊發展史的專著。周葱秀、涂明合著《中國近現代文化期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除了闡述中國近現代文化期刊發展外，還記錄了大量關於文化期刊的資料，可視為有關方面的一部參考工具書。來新夏等著《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耗費十年時間才告完成，詳述近代中國圖書事業的發展，並整理了大量有關中國圖書的資料，甚具參考價值。

除上述著作外，有些學者試圖從政府對刊物的監控來觀察近代中國報刊事業的發展，林語堂探討宋代至1930年代期間中國的專權君主制度與民間言論或報紙言論發展之間的關係，他強調中國歷代的政府監控是社會上未能產生自由言論和阻礙報業發展的最主要原因。¹⁶亦有學者試圖從政府對刊物的監控來觀察近代中國報刊事業發展史，揭示了從1900年至1949年間不同的中國政權對出版事業的監察與控制，並透過對當時出版法和出版規條發展史的深入研究，來評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府壓抑反對政府言論的工作及其成效。¹⁷這些著作揭示了專制政府對近代中國的報業發展來說，絕對是一個阻礙，但是，仍然忽略了近代中國各類刊物對政治、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發展所造成的影響。踏入1980年代，愈來愈多學者留意到各類刊物與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關係。¹⁸這類著作加強了對有關方面的重視，使近代中國報刊史研究更臻於充實。

然而，以《東方雜誌》為主的研究始終不太多，這方面的專書和論文仍欠全面和深入。比較重要的專著是黃良吉的《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此書以近代中國的外交發展為出發點，闡述了《東方雜誌》自1904年3月創刊至1948年12月停刊為止的出版情況，介紹了該誌的性質、內容和特點，並肯定其對國家民族有重大貢獻。著者對《東方雜誌》作了一次有系統的研究，對其內容、結構及發展也有獨特的看法，但《東方雜誌》涉及的內容實太廣泛，此書只能述其概要。

16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17 Ting Hsu Lee-hsia,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8 例如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時報》為研究對象，探討近代中國報業的發展如何影響晚清的改革文化；Yeh Wen-hsin, "Progress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i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huo Enterprise, 1926–1945," in Frederick Wakeman, Jr. and Yeh Wen-hsin,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86–238 則指出《生活週刊》刺激了民國時期居住在上海市區的人民的政治意識。

(四)

作為一份在近代中國史上甚為重要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東方雜誌》近年開始成為專題研究的對象。以該誌為題的碩士論文，重要者有三：其一，是李盈慧的《抗戰前三種刊物對中日問題言論之分析——東方雜誌、國民週報、獨立評論之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其二，是張杰的《論清末的東方雜誌》（北京：河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其三，是盧淑櫻以英文撰寫的《1928年至1937年間東方雜誌中所見的日本帝國主義形象》（Lo Shuk Ying, *Imag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Eastern Miscellany, 1928-1937*, M. 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8）。李盈慧和盧淑櫻均利用《東方雜誌》探討抗日戰爭前中日關係的發展。前者以史學和新聞學的研究方法，透過對《東方雜誌》、《國民週報》和《獨立評論》三份刊物內所刊文章的分析，窺探抗戰前夕的中國輿論界如何影響當時國民政府的對日策略；後者則專以《東方雜誌》為依據，探討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印象。張杰則把焦點放在《東方雜誌》對晚清立憲運動的分析之上，並力言《東方雜誌》發揮了它對知識分子讀者群的重大影響力，除了向讀者解釋了立憲的真正意義外，更對晚清整場立憲運動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上述四種探討《東方雜誌》的著作和論文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透過對《東方雜誌》的研究，來考察近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發展。無可否認，《東方雜誌》的確保留了不少有關政治和外交問題的文獻資料，不過作為一份綜合性學術刊物，該誌也刊載了很多論述文化問題的文章。《東方雜誌》不僅保存了大量有關近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發展的好材料，更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重要史料，可惜學界在這方面還沒有足夠的注意，誠甚可惜。

近代中國文化的進程，飽受西方文化衝擊及列強侵略的影響，知識分子要在國家民族掙扎求存的惡劣形勢下，為傳統文化尋找出路。《東方雜誌》在這方面所肩負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該誌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其影響力及於眾多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備受重視，誠為促進近代中國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工具。該誌在長逾四十年的出版歲月中，不僅向廣大國民傳播新知識，更刊載大量討論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文章，從中可以窺探近代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文化變遷及其面貌。

東西文化調和論是《東方雜誌》就近代中國文化發展方向而提出的最重要主張。近代以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相信國家積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傳統中國文化弊病叢生，故此尋求中國文化的改造良方遂成為時代的重要任務。《東方雜誌》在這方面也付出了很大努力，該誌認為，傳統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的最正確出路，應當是與西方文化的優良元素結合，以創造一種融合東西文化長處的新中國文化，從而帶領中國走向富強。

藉著提倡東西文化調和論，《東方雜誌》成為近代中國其中一份最具影響力的刊物。透過刊載支持文化調和論的眾多文章，也令該誌不斷與知識分子對話，共同討論中國文化的發展路向，並成就了它在近代中國報刊史及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近年中國銳意改革，國家對外愈益開放，世界新思想、新文化勢必再次湧入中國，使文化發展更趨蓬勃。在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握這種機遇，重振中國文化的同時，《東方雜誌》或可作為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為我們帶來不少啟示。這正是該誌的文化意義，也是其可貴之處。

【作者簡介】范永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師。

❖ 研究札記 ❖

制度與福利的配合—— 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員工規則初探

區志堅

一、引言

一間公司的生產品成爲眾人的關注點，除了有賴市場部員工的努力、優厚的薪金鼓勵員工外，更有賴公司內部建立健全的制度。縱使有時爲方便人事的發展，或出現理念與制度的衝突，也不能否定建立健全制度的重要性，這樣會使公司員工明白升遷的標準，按公司行政規章作出適當配合及健全的員工保障制度，更促使公司上下同心協力。談及近代出版集團、發行集團的組建及改制、規章運作及章程、系統制訂，其詳細又具人性者，必要談及民國時期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的行政規章，商務頒發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編審部暫行辦事規則、主計暫行辦事規則、贈書券施行規則、學生學徒規則、女同人生產假津貼薪工暫行規則、同人長期儲蓄規則施行細則、同人人壽保險暫行規則、同人子女教育補助暫行規則施行細則、同人賻慰金暫行規則、新進同人須知等，不獨注意公司的組織業務、股務、事務、員工的培訓及待遇外，更注意員工保險及安全衛生，這才能使勞資雙方相處融洽，員工與僱主共持相同理念，才可推動公司業務的發展，勞資融洽相處，成爲促使商務發展的重要力量。前人也曾說及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港期間，爲商務籌辦出版書籍事情，商務不獨安排蔡氏在崇正會館宿舍，更於蔡氏病逝後代爲安排祭禮，可見商務以較佳的福利給予員工。¹ 本文藉研究商務員工規章以見近代企業的發展，不可簡單地看成爲僱主與員工之間的對立，而應注意員工福利及培訓，這是推動近代企業發展的重要成功因素。²

二、規則內容

依 1935 年編印的《商務印書館人事管理概況》中指出 1926 年商務行政人員已感到員工日多，員工每因待遇參差，時起紛爭，1930 年王雲五任經理，改人事股爲人事科，至 1932

1 見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1940年3月8日條〕（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1卷，頁512。有關蔡元培商務的關係，見周佳榮：〈蔡元培與香港的關係〉（未刊稿），發表於2005年3月12日，假座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舉辦「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與香港」研討會。

2 前人對商務印書館的研究，見拙：〈一本由「商務人」撰寫的非一般「商務史」——評李家駒著《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當代史學》，4期7卷（2006），頁90-96。本文運用有關商務規章資料，見汪耀華選編：《民國書業經營規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一書。

年經「一二八事變」，商務重新頒定規章，其不獨注意人事管理，還注意員工福利事項。

先看員工獎懲制度，規章上談及上海發行所門市柜及分廠職工的實在時間定為九小時，各館均設有到班鐘，職工每日上午及下午到館及每晚離館應各自按打鐘片，因私事請假外出者，除開具請假單外，於離館及回館時均應按打鐘片，因公事出外者應開具公出單，不必再按鐘片，凡有失按鐘片情事，應即開具失按單，經主管人員簽字後，送交人事科或兼辦人事人員，間有部份辦事人員於上下午到班時應各簽名於片上，經主管人員每晚將片簽字後送交人事科，凡職工有事須請假者應先開具請假單或緊急假出單，或特種請假單，經主管人員核准後，送交人事科，若假期已滿尚未畢事者，應先期續假，如臨時發生重要事故或疾病不及具備請假手續者，應以最速方法通知人事科或主管，隨後補具請假單。為了方便獎勵及懲罰，規章要求：平日由人事科及部份任職主管人員隨時考核，「每遇契約滿期，再由人事科根據記錄，徵詢主管人意見匯填考核表，以作續約與否及增加酬報與否之標準」，每位職工均有記錄片，並有照片，列明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地址、程度、經歷、保證人、介紹人及歷年職務、按月薪工、請假日期，凡關於職工獎懲及其他一切事項也記載其中。當然，今天看來這些獎懲制度對員工而言，已有所限制，但在企業發展過程中，這是不得已的制度，有一套完備規範員工的方法，自然獎懲較合理，賞罰清楚，自然使員工能按步就班，不致因個人行為影響企業的發展。

表面上看，商務對待員工態度嚴苛，其實亦注意員工的福利、待遇及條例均具「人情味」，在〈職工待遇〉中規定：上海發行所柜友在星期日下午照常工作加給薪水半天，各地分館職工星期日全天工作，加薪水一天；星期日均給假一天，年節方面，總管理處及各分廠給假三日，紀念節假期照國民政府規定辦理，年節、假期內如適遇星期日補假一天，紀念節假期內如適遇年節假期者不另補給，上海職員每年各給特別休假二十四天，上海各廠工友的特別休假依照工廠法，凡在職未滿三年者每年休假給七天，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每年休假十天，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給予十四天，以後每年加給一天，加至三十天為止。

商務更給予員工津貼及撫恤，體察員工的辛勞。在規章中指出：公司分館的副協理、會計主任、分廠廠長、副廠長、各股股長，均由公司提供居住津貼費；分館經理及會計主任也獲居住費，更有「遠省津貼」，凡由總管處派往分館廠的職工，每年回家一次，津貼來回川資，不回家者每年也有津貼，若職工因職務受傷，由公司給予醫藥費，治療期內每日給予照薪工二份之一，但總計至多以一年為限，因職務受傷致殘疾，公認為不能任事者，得按殘廢部份的輕重，酌給津貼一次，或分期支付，以一年的薪工為限，若「因職務受傷致死者，公司給予五十元以為喪葬之資，並酌量情形特別撫恤」。

若員工因公支用銀但員工財力有限，可以向公司暫借銀錢，如各部份拍發電報費、臨時寄件郵費及提貨付捐費，憑單開就後，須先送經主計部總查明簽字，便可以出納款項。

對於新進人員的培訓方面，商務尤注意「欲求其勝任愉快，職工自身之知能首應與時俱進，以為社會受更大之勞務」，若從學校畢業的新任職工，商務不論其學歷高低均須經過練習，初入館時以三個月為試習期，雙方同意，便正式練習時期，規定一年至三年，或指定一個部份練習，以「大致係就公司中之需要情形並參考個人興趣之所在，分別酌派」。大學程度之練習員由公司聘任的管理主任及指導員負責訓練，中小學程度的學生及學徒，由公司指定的業師負責訓練，並須受補習教育。更為初入行的職工，開辦營業員講習班、暑期儀器製造講習班、文具儀器訓練班、業務講習班、英語訓練班，更聘請「富於教學經驗之西籍女士於每星

期一、三、五日上午七時至八時半個別口授英語，自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十日開班，以六個月為期，因為其時商務多聘請中學及初高中學歷程度、學識較淺的學生學徒，故「規定必須於工作時間外受補習教育」，並分別資送入職工補習學校晨夜班，補習國文、英文、簿記、會計科的知識，學書費由公司負擔，又為員工開辦華文打字機練習班、發行所學生訓練班及主計部學生講習班，更為「鼓勵各職工之向心理，維持公眾秩序，增進工作效能起見」，特撰擬標語多種，製成搪瓷牌，懸掛在各工場所，俾各人時知警惕，努力不懈，共負「為文化而奮鬥」的使命。

商務也替員工明文規定「長期儲蓄」及「普通儲蓄」兩類。「普通儲蓄」下分為定期及活期二種，前者以五千元為足額，常年利息九釐，後者以一千元為足額，常年利息八釐，超額者不計利息，總館同人得兼存活期、定期，凡願儲蓄者，第一次應由任職部同人存款介紹書，經主管人員簽字後，連款送交主計部出納科，出納科收到款項後，定期發給存單、活期發給存摺。至於同人長期獎勵儲蓄方面，凡願意存儲者，該人每月額定或假定薪工中扣提百份之五為長期儲蓄金，各同人每年所得的特別休假薪金及分派的獎勵金，亦加入長期儲蓄金，儲金年利以一分計算，如儲滿三年未曾停止者，自第三年起年利加增一釐，滿五年未曾停止者，自第五年又加一釐，以一分二釐計算。

公司為增進同人福利起見，於1933年4月21日與泰山、友邦、四海三家保險公司訂立公司合同，為同人投保團體終身壽險，凡公司在職同人，除學生、學徒、女職工外，如在國難前舊同人經正式訂立聘約者，新進同人及分支館、分廠同人正式進用已滿一年，均可投保壽險，但以年齡五十五歲以下者為限，保險費按照各保險公司的規定標準繳付，半數由公司在特別公積項下撥作津貼，半數由各投保者自行認付，先由本公司墊付後，隨在各投保人薪工內分兩個月扣清。

公司也為員工提供疾病補助，並經指定醫院、藥房，為同人診病、住院、配藥之所，同人患病如依公司指定醫院治療的，應先向人事科領取送住醫院單據，每日住院一元以下由公司補助，超過一元者補助一元，超過二元者經公司同意得補助半數，如施用手術或注射藥針，其手術費及藥資亦得按照上項補助其住院費的比例，由公司補助，又如患病不住醫院的，病人可持藥方往指定的藥房配取藥物，以四聯收藥單簽字後給藥房，不必付給現款，上項醫費與藥費由公司補助全數。若病者不能親往公司指定醫師處門診者，得請醫師出診，可由家屬向人事科取請醫師出診單據，其出診費只自出一元，其餘由公司補助，藥資補助全數，領藥手續與門診同。

對於婚喪生產津貼方面，公司規定請假，其情形限於本人結婚、父母夫妻喪、祖父母喪及兒女結婚，要通知主計部，由公司提供特別津貼，女同人生產前後請假八星期，因請假所扣的薪工，亦由公司提供特別津貼。

公司也為員工提供獎勵金，在規章中指出如得有盈餘，除先提十份之一為公積金，次提股息常年八釐外，其餘均分為甲、乙兩部，以乙部的半數為同人獎勵金，其分配的比例為總經理佔百份之十，全公司同人普遍獎勵金及特別獎勵金各佔百份之四十五，月薪之計算，以各個同人每年十二月份的定額薪水為準，每元為一分，不滿一分的零數作一分計算；又特別獎勵成績優異的同人，除總管處副科長，會計主任以上人員的特別獎勵金，由總經理先行提出一部份，按其職務的繁簡及各本人與主管部份的成績外，其他各同人的特別獎勵金，另定有派發的標準，派發標準分為四組：總管理處各部份同人、各工廠同人、上海發行所同人、

各分支館同人，每組假定爲一百分，各以上年度該組全體開銷與營業數量或生產價值的比例，與本年同比例比較，酌量增減，開銷愈低，分數增至一百五十分，開銷愈昂，分數減至五十分，以各組實得分數與其全年薪水相乘，即爲各組得派特別獎勵金的標準數。

商務也爲員工子女提供教育補助，在 1926 年已設扶助基金，補助額定爲小學一千名，中學一百名，大學五名，均以公立或已經各地教育行政機關准許設立的學校爲限，各級學生補助金額，小學按肄業學校所收學費補助全數，但至多每年每名補助二十元，中學每名補助四十元，大學每年每名補助二百元，凡在公司任職滿一年以上，月薪或假定薪資在一百元以上的同人均可申請，每家以一名受補助爲原則，有餘額補助第二人，中學及大學補助生則限於同人子女的成績優異者，中學生額以在公司任職二年以上的同人，大學生額以在公司任職滿二年以上的同人爲準。受中學、大學補助金的學生，每家均以一人爲限。各級補助生的申請每年舉行一次，聲請人應於每年六月底以前填具申請表，受補助各生應於每學期終結時，把學校成績報告送交人事科，凡在校留級者即停止補助。

當然商務以出版及販賣書籍爲主，凡公司同人以現款購商務出版的圖書照門市售價八折計算，特價書及公司指定的大部份書，原版西書照九折，每種書每人每年以一部爲限；爲求培養員工身心健康，公司盡力資助同人業餘消遣，每於精武體育會、青年會、國術館徵求新會員時，公司即力爲介紹，除本人付一部份會費外，並由公司津貼若干，凡入會者得享受學術研究、運動、參觀、遠足等多種利益，此外同人等自動組織者有攝影研究社、書法研習社等，並組織小球隊與外界比賽。

公司在規章中，注意各項安全衛生設施。商務於 1933 年設立安全委員會，聘請館內外工程及衛生專家任委員，負責計劃與指導公司各種設備上的安全、防火及公共衛生等事項。各委員按期輪流至各辦事處所工廠實地視察，並委托營業員代爲視察各地分館分廠的安全衛生等設施，規定工友工作完畢必須洗手。公司並應於放工時作不定期的檢查，又絕對不許在工場內進食，如遇延長工作時間必須購食點心時，必要先行洗手，又規定員工茶杯、手巾須每人一份，各自收藏。又請衛生機關派醫生前來公司，爲各同人接種牛痘及傷寒疫苗。又爲防火，規定員工重新訓練學習運用新的滅火器，公司也會選派員工於每星期二、四兩晚六至七時前往醫師處聽講，學習急救訓練；上足二十課，經考試合格，各人回廠工作並擔任急救事務。又爲防止日久生疏，仍令曾受訓練各人於每月輪流赴衛生事務處實習一天。

三、小 結

要成爲一個世人聞知的品牌，不獨有賴市場部的推廣、健全的行政架構，更重要的是對員工提供福利，把員工的獎懲與福利事項，在規章內清楚列明，既爲員工效法，也爲員工因公司的福利較佳而安心工作，使勞資雙方由昔日只以人情的主觀判斷及個人感情的維繫，發展至制度化的清楚條文及規章，而列明的規章，也注意員工的福利，達到寓人情在制度中，使企業機構發展系統化，爲員工提供福利時更爲客觀，這也是近代企業發展漸由昔日只重視人情，至走上重視制度化的方向。

【作者簡介】區志堅，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

❖ 書 評 ❖

【法】戴仁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

書名：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

著者：[法]戴仁著，李桐實譯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北京）

出版時間：1996年

頁數：155頁

商務印書館歷史悠久，自1897年在上海創立至今已逾百年，向執中國出版界之牛耳，在行內的地位無可代替。近廿年來，學術界開始注意中國出版業的歷史，商務印書館順理成章廣泛受到學者重視，有關的專著如雨後春筍，包括：久宣《出版巨擘：商務印書館》（1999年）、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2000年）、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2005年）、史春風《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2006年）等。商務印書館也相當重視本身的歷史，先後出版《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1897-1992：我和商務印書館》（1992年）和《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1998年）。相對而言，法國漢學家戴仁（Jean Pierre Drège）於1978年出版的法文專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¹，雖然在撰寫該書時可供參考的資料仍較缺乏，但畢竟是西方漢學界最早研究商務印書館的著作，其價值理應受到肯定。

戴仁此書由李桐實翻譯為中文，1996年於北京出版。全書除〈引論〉和〈結論〉外，分為四章。作者在〈引論〉中首先談論出版家的職能和扼要回顧19世紀末中國出版界的概況。第一章敘述商務印書館的誕生和成長（1897至1919年），這時期商務印書館最重要的發展，是在1903年設立編譯所對來稿進行篩選和開發編教科書的市場，前者使商務印書館成為一家地道的出版企業，後者則令商務印書館成功壓倒其他競爭對手，成為中國出版者中的第一把交椅。

第二章討論商務印書館從1919年五四運動至1932年1月28日被日軍轟炸期間的發展。隨着五四運動的爆發，商務印書館所刊行的各類雜誌，都無可避免地因受到新的文學潮流衝擊而需要進行改造，以迎合市場的需要；其他例如開放東方圖書館、創制新的圖書分類法、引進美國的「群眾性生產」概念、出版「萬有文庫」等，都是商務印書館在這個時期的重要發展里程碑。作者在本章的第五節也有述及當時商務印書館所建立的各項制度和工運情況。

1 原著的法文書名是 *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由法國公學高等漢學研究院（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於1978年出版，全書共283頁。

第三章討論 1932 年至 1949 年間商務印書館的興盛與衰落。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雖然被日軍炸毀，但總經理王雲五仍然決心重建與進行改革，制定多項新的銷售策略，吸納本來不讀書的群眾，以開拓市場，令企業得以轉危為安。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內遷重慶，雖然身處亂世，但仍能針對當時的局勢需要發行叢書；與此同時，商務印書館在淪陷區內的業務也沒有終止，儘管被迫要與日本人妥協。1945 年抗戰結束，正當商務印書館欲重新振作時，國共內戰旋即爆發。直至 1949 年，隨著共產黨日佔上風，社會主義的出版市場大增，標誌着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的商務印書館在大陸的出版市場進入倒數階段。

第四章題為〈商務印書館的產量〉，透過統計不同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出版量與種類，揭示商務與時代環境之間的關係。出版物或出版物內容的調整，往往能夠反映政治、社會或文化形勢的轉變。此外，作者在簡單的〈結語〉之後編有三個附錄，分別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期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叢書和詞典〉和〈王雲五的十進制分類法〉。在當時缺乏足夠資料的情況下，作者仍然能夠編成這三個附錄可謂殊不容易，即使到了今天，這些附錄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戴仁此書面世已接近 30 年，誠如譯者指出，書中某些觀點和結論有可供斟酌的地方，例如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後來成立的中華書局和開明書局的目的不在於尋求出版和發行的新方式，也不是追求另一批群眾，他們插手於商務印書館的同一市場，所用的方法也毫無二致。（頁 119）但其實陸費逵等人正就是不滿意商務印書館的經營方式而另起爐灶。作者未有深入探究中華書局、開明書局等出版社的歷史而作出此結論，不免有點輕率。

另外，本書仍有值得我們省思的地方。出版社是聯繫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協調裝置（*matching device*），它的任務是幫助作者或書本尋找讀者，同時也將讀者介紹給作者。² 將思想與知識廣為傳播本來就是出版社的社會和文化功能。不過，出版既是社會和文化行為，但同時也是商業行為。³ 出版社作為企業的一種，在今日愈趨商業化的社會裡，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有選擇性地出版市場價值較高的來稿本屬無可厚非。出版社在賺錢之餘，能否繼續扮演本身的社會和文化功能，做到作者在〈引論〉所指的要在理想與商業之間取得平衡（頁 4），就真是要考驗局中人的智慧。

甘穎軒（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

2 Herbert S. Bailey, Jr., *The Art and Science of Book Publish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0), p. 11.

3 *Ibid.*, p. 17.

❖ 書 評 ❖

鍾寶賢著 《香港影視業百年》(修訂版)

書名：《香港影視業百年》(修訂版)

著者：鍾寶賢

出版者：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4年10月初版，2007年1月修訂版

頁數：440頁

香港的影視工業，顛簸的走過百年滄桑變幻，默默的劃出無數顆耀眼明星，拼貼出一幅又一幅令人驚嘆的幻影拼圖。從「電影」和「戲院」相愛相分的故事看「東方荷里活」的形成，進而探討香港獨有的「垂直整合」工業合縱連橫，以及香港影視業「上映窗戶」演變的特殊途徑，成為《香港影視業百年》一書的靈魂結晶。

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的「香港電影典藏」系列，推出了《王家衛的影畫世界》、《映畫X音樂》、《邵氏光影系列》等多部香港電影專著後，新近又有鍾寶賢教授的《香港影視業百年》問世。到目前為止，完整地縷述香港電影發展軌跡的專著似乎還欠缺這麼一部。方保羅主編的《圖說香港電影史，1920-1970》(香港：三聯書店，1997)是圖文集，張徹撰寫的《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香港：三聯書店，1989)是傾向以影人為主的口述紀錄，余慕雲出版的《香港電影史話》(香港：次文化堂，1996)是數本資料性紀錄集，李以莊、周承人十年磨劍寫成的《早期香港電影史(1897-1945)》(香港：三聯書店，2005)亦只屬於戰前的香港電影紀錄，還有其他一些更「零碎」的電影回顧專題及藝術特色通論。《香港影視業百年》可以說是闡釋香港百年影視業完整發展脈絡的第一部學術性專著。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位處邊陲的香港已與上海及新加坡結合成一個跨國娛樂事業網絡，架起一個不受政治約束的營商業務環境，以滬、港為製片基地，將自製的商品(華語電影)供應予星馬一帶的龐大戲院網絡群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荷里活式「垂直整合」影視王國先後在本土落成，香港亦成了最大的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肆意地將旗下商品(華語電視節目)放射性地傳送至全球華人電視網絡群之中。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鍾寶賢博士，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進行香港電影研究，多次走訪各影視場所，搜尋原始史料及進行口述歷史訪問；自2000年起，更在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刊物上發表多篇有關香港電影業的專題論文，並不斷地在報刊上撰寫影視業評論，長期的資料累積和思考，形成了本書的主線，就是以香港影視的百年經歷幻化成「電影」和「戲院」相愛相分的故事，概念性地展現出香港電影發展的主要脈絡；並沿著歷史的角度探索她們的發展軌跡，進而剖析香港能夠成為全球華人社會影視工業重鎮的成因。

《香港影視業百年》原已寫了三十多萬字，經刪減之後仍然有二十多萬字，厚達四百四十頁，可見此書的資料非常豐富和翔實。鍾寶賢教授以嶄新的研究角度、淺白流暢的文字，配上一幅幅極其珍貴的歷史照片，彷彿帶領讀者走上一部歷史時空穿梭機，如幻似真地開展了一場香港電影百年回眸之旅。本書的資料來源以原始電影史料與國內外影視書籍為基石，結合作者多年來訪問多位影人所得的口述資料，為那些對香港影視史、華人家族史、普及文化史感興趣的讀者，實實在在地上了寶貴的一課。

研究歷史首要的條件就是要配備充足的史料，特別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過往香港電影史研究之所以停滯不前，當中核心原因是研究者無法參閱及「網羅」有關史料。有關香港電影的史料雖然零碎，幸而資料相當豐富，甚至可說是保存得相當完整的。本書就是作者在佔有第一手資料、並走訪不同年代的影視紅人的基礎上寫成的一部電影巨著，致令此書創造出令人驚嘆的成果。

歷史是充滿弔詭的，回顧過去，《香港影視業百年》為我們重溫了香港的電影藝術，在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人世界是最為閃光的。香港的優秀電影、導演、演員，確確實實的在國際上贏得很高聲望；展望將來，《香港影視業百年》亦令我們深刻反思香港電影與社會的關係以及香港電影工業能否繼續在亞洲地區發揮龍頭作用等問題。近年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創意工業，高質素的電影製作此起彼落，是否闡明香港的影視業已在廿一世紀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無論如何，要讓港人更了解自己的過去，也讓全球華人更了解香港，鍾寶賢教授實在盡了相當份量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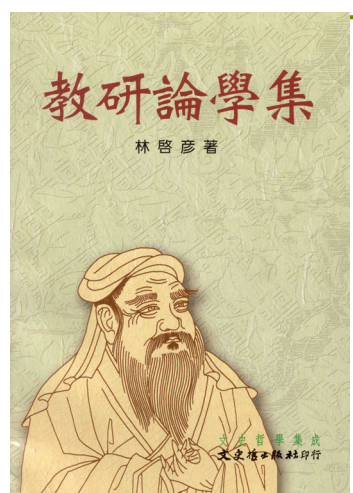
黃曉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研究生）

❖ 書刊介紹 ❖

浸大歷史系同人近刊新書介紹

林啟彥：《教研論學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33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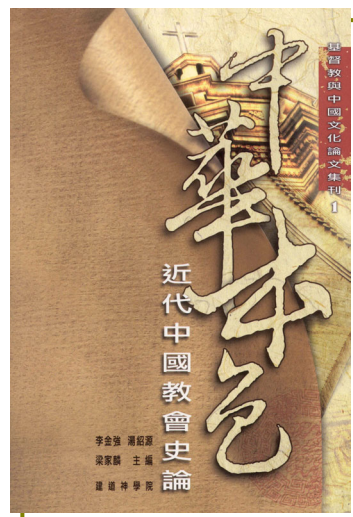
本書是筆者從事教研工作以來，多年積累得來的一些介乎學術與半學術性質文章的結集作品。這本文集共收錄文章三十八篇，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史學研究與評論，另一類是論史雜文。前者包括了：1、史學研究方法與研究動態論述的文章；2、史事、史料的考訂與史著的評介；和3、對學者感懷之文。後者則為一些面向較廣泛聽眾與讀者群的演講及報刊雜誌的撰文，其主題內容雖然比較分歧，但重點多集中於對傳統中國學術文化問題的反思與對近代中國民主及現代化課題的探討。



李金強、湯紹源、梁家麟主編：《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445 頁。

自 2001 年起合辦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至今已屆第四屆。今屆乃以「近代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歷史回顧」作為主題，於 2005 年 6 月 17 至 18 日在浸會大學舉行，出席的中外學者分別來自兩岸三地、星加坡及美國，合共發表論文二十八篇。

論文的內容主要包括五方面。其一，為本色化理論的探索。其二，主教、牧職、信徒的生平、本色化思想與主張及其實踐的探究。其三，教會及其組織的本地化、本色化的發展及貢獻。其四，區域研究，分別為長洲的教會發展，清末民國潮州教會的功能分析，及 1941 年前香港基督教教會地理分佈模式。其五，其他如太平天國對上帝與基督的翻譯、《真光雜誌》的女權態度，以及《禮記》與《聖經》性別意識的比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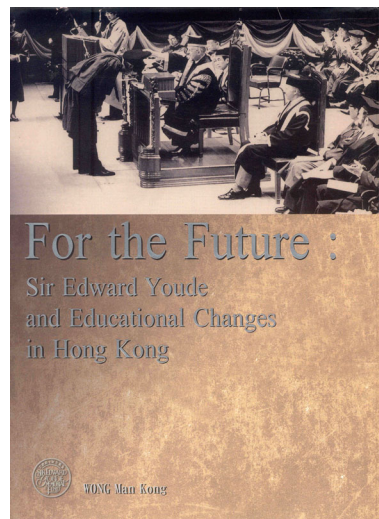


其中值得注意為人物方面的新研究，包括王煜初、張祝齡、郭斐蔚、胡振中；以及尚乏學者注意的組織如軍牧制度、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靈實協會、瑪利諾女修會、納匝肋書館；而更重要則為對基督教的區域及女權的研究，此為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方向，相信後繼學者將會就此二課題繼續進深研究。本書即從上述會議論文中，審選十八篇，結集出版。

Wong Man Kong, *For the Future: Sir Edward Youde and Educational Chang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ing Pao Publications, 2007), 295 pages.

The subtlety of the phrase, “for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king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s obvious. As is well known, Sir Edward Youde committed his mind and heart to tackle the almost impossible task of assisting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ov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But not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another focus of Sir Edward’s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the preparations directly targeting a better futur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major focus of the present book is to highlight the work which Sir Edward Youde, the 26th Governor of Hong Kong (1982-1986),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This book gives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while paying specific attention to three major issues, namely: access to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standards, and the nature of curriculum changes. Moreover, it will discuss how and why technical education underwent significant growth. The heavier portion of the book is to take into account multi-dimensional expansion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includ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growth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old and new. The book also records the outpouring of grief at his premature passing in Beijing in December 1986. It then discusses the lead given by Lady Youde and the Government in establishing an education fund in his memory, followed by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Fund and its achievements. Finally,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a general assessment of his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s educational history as a whole, using two key concepts, “education in politics” and “politics in education.”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書刊介紹 ❖

朱益宜博士研究瑪利諾修女的三本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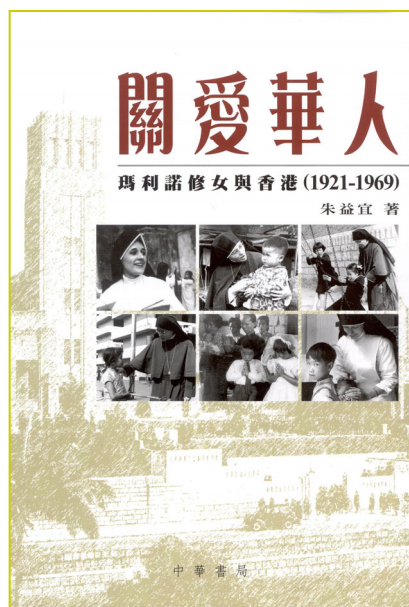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朱益宜博士近年來致力於研究「瑪利諾修女與香港 (1921-1969)」，其英文專書已於 2004 年在美國紐約出版，中文版於 2007 年在香港出版。另外，朱博士又將 1921 年至 1966 年間香港瑪利諾修女的日記選編結集出版，供有興趣的人士參考。以下是這三冊書籍的介紹：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 (1921-1969)》(香港：中華書局，2007 年)，304 頁。

美國瑪利諾修女自 1921 年到香港傳揚天主教，並為香港基層市民提供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服務。她們的足跡是香港社會的滄桑記錄，也是一篇無私奉獻的愛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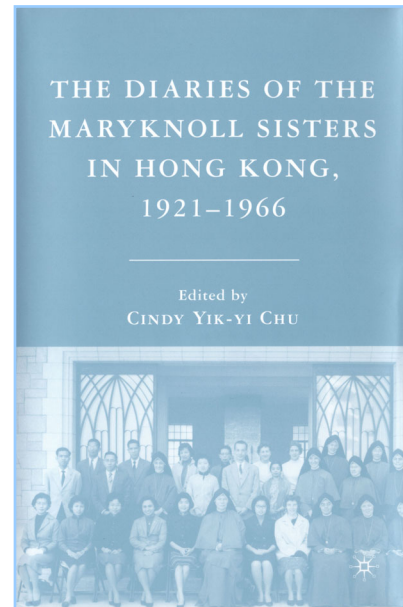
本書在 2004 年先出版英文版，現由作者親自翻譯成中文，以饗華文讀者。作者引用了瑪利諾修會及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文獻和瑪利諾修女的日記，並訪問了一些修女；在美國瑪利諾傳教檔案處許可下，本書收錄了數十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反映香港社會發展史的一面，是香港研究的一個補白，中文同類出版物少見。

另外，此書又提及日治時期的香港生活，柴灣、黃大仙、觀塘等社區在 1950、1960 年代的建立，香港早期的徙置大廈、醫療及社會服務等，都是香港人的深刻經歷，既具歷史資料價值，也充滿懷舊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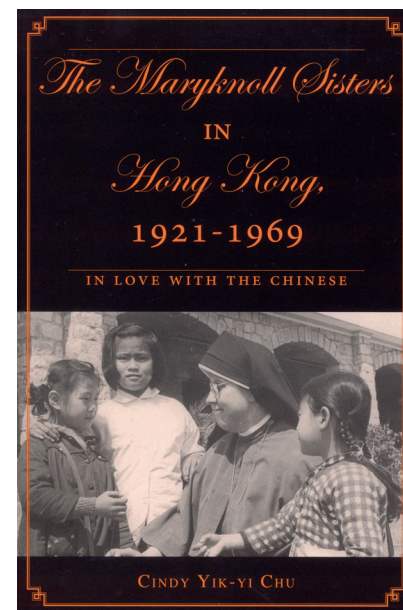
Cindy Yik-yi Chu (ed.),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41 pages.

This book is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Hong Ko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as recorded in their diaries written from the 1920s to the mid-1960s. The readers follow the Sister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daily life: going where they went and meeting who they met. This book merits the attention of anyone interested i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adventures. As a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the diaries will be of tremendous value to student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investigating subjects such as Asian studies, mission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214 pages.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adaptation of American women to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1921 to 1969. The Maryknoll Sisters were the first American Catholic community of women founded for overseas missionary work, and were the first American Sisters in Hong Kong. Maryknollers were independent, outgoing, and joyful women who were highly educated, and acted in professional capacities as teachers, social workers, and medical personnel. The assertion of this book is that the mission provided Maryknollers what they had long desired –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 which were only later emphasized 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e 1960s.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向 ❖

浸大歷史系活動匯報 (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

※ 第二次「應用歷史與公眾文化論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於2006年9月23日舉辦第二次「應用歷史與公眾文化論壇」，主題是「尋找香港文化的身份和創意：歷史·通識·人生」，有逾百人參加。此次活動分為三部份：（一）「香港大眾娛樂」公開講座（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共同策劃），由鍾寶賢教授主講「流聲歲月：香港唱片業與樂壇造星記——從本土流行文化到全球化」；（二）「香港史考察報告」座談會，主題是「如何運用香港文化史材料進行專題研習」，由周佳榮教授主持，講者有范永聰博士、侯勵英小姐和彭淑敏小姐；（三）「香港文化專題」圖片展覽，計有「眾樂與獨樂：香港大眾娛樂的轉變」、「樂在球中：香港足球的集體回憶」、「世紀回眸：香港影視發展史」、「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會與民生」、「香港報刊·廣告·漫畫發展史」、「五、六十年代粵語片的黃金時期」等。

※ 浸大歷史學會學術週

香港浸會大學第二十八屆歷史學會學術週於2006年10月16日開幕，主題是「中國音樂」，由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李金強教授及歷史學會主席莫慶新同學致辭，歷史系多位老師及學生事務處代表出席。17日舉行學術講座，由浸大中文系劉楚華教授主講「古老音樂傳承——崑曲和古琴」。其他活動還有書展及展板展覽等。

※ 浸大中國研究學會學術週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學會於2006年10月16日至20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學術週，主題是「蒙塵的記憶——中國傳統玩意」。開幕典禮邀請中國研究課程主任陳峰教授、學生事務處輔導長何鏡煒博士及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代表致辭，籌委會主席文爾珩同學介紹學術週的活動內容；學術講座邀請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主講「中國傳統玩具及其現代變遷」，其他項目包括問答比賽、書展、專題展板及玩具試玩攤位等。

※ 章群教授紀念公開學術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章群教授紀念公開學術講座」第六講於2006年10月24日舉行，邀請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及助理課程總監區志堅博士擔任主講，題目為「錢穆與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新亞精神及其實踐」。

※ 浸大歷史學系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於 2006 年 11 月 24 日舉行講座，邀請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黃宇和院士主講「孫中山在澳門行醫地點考察」。

※ 中國文史專題研習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天主教伍華中學合辦的第二屆「新時代、新課程：中國文史專題研習講座」，2006 年 12 月 2 日下午於浸會大學鄭翼之講堂舉行。開幕典禮由浸大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致歡迎辭，天主教伍華中學龔廣培校長、理大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區志堅博士及樹仁學院歷史系系主任鮑紹霖教授致開幕辭，大會嘉賓林乾禮議員致送紀念品。浸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侯勵英小姐擔任大會司儀。

本屆共有八個專題報告：（1）天主教伍華中學「口述歷史的實證功能——以天主教伍華中學校史研究為案例」；（2）聖公會梁季彝中學「小玩意」；（3）青年會書院「一次廣州交流的考察報告」；（4）聖公會陳融中學「光陰五十年——由石湖墟市到上水新市鎮中的上水鄉事委員會」；（5）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林夕詞中的『直述』與『呈現』」；（6）聖公會梁季彝中學「抗日」；（7）香港樹仁學院「香港海洋公園歷史發展研究」；（8）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漁港與神靈」。

區志堅博士、樹仁學院歷史系副系主任羅永生博士及天主教伍華中學中國歷史科主任姜嘉榮先生分別就各個專題報告作了評論。大會還安排天主教伍華中學梁昊翹同學粵曲獨唱，作為助興節目。最後，由講座籌備委員會代表鄭惠兒女士致閉幕辭。

※ 第四屆「文化旅遊研討會」

2006 年 12 月 9 日，第四屆「文化旅遊研討會」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主題是「香港風景與社會特色——遊記、旅行指南及視覺文化」，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旅遊工作坊、香港註冊導遊協會、香港警察歷史學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新世紀論壇聯合主辦。

在開幕典禮上，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教授、香港註冊導遊協會副主席侯婉芬小姐致詞。研討會由區志堅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主持，包括三個演講：一、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講「近代中日旅港名人見聞錄」；二、張迪生先生（資深旅遊從業員）講「歐美旅遊書的記載與現實導賞的奇趣」；三、林少麟先生（和聯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講「日本訪港旅客的奇趣與導賞書籍的問題」。最後由彭惠玲小姐（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旅遊及酒店款待學部統籌）作總結。逾三百人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反應非常熱烈。

※ 設立「蕭瑞麟女士紀念獎學金」

是項獎學金之增設，乃緣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在 2006 年秋季所得一筆私人捐款。該獎學金得主必須為註冊修讀文學及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或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並主修歷史的學生。得獎條件係以最優秀成績（以 GPA 為準）完成一年級課程。如持有最高

GPA 者超過一人，獎學金將由資格相同者均分。獎學金之首次頒授定在 2007 年 9 月。獎學金金額每年不同，完全視乎該年度基金所得利息而定。

※ 歷史系研究生講論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於 2007 年上半年舉辦了四次研究生講論會，分別由四位博士研究生擔任主講，由指導授主持，詳情如下：

日期	題目	主講	主持
1 月 25 日	福建基督宗教史研究述略	彭淑敏	李金強教授
3 月 1 日	中國天主教人物研究概述——以中文資料為例	林雪碧	李金強教授
3 月 8 日	粵語電影的興衰（1930-1960）	黃曉恩	鍾寶賢教授
6 月 7 日	近代中國出版與教育——《教育雜誌》的個案研究	文兆堅	周佳榮教授

※ 歷史系研究生會新春團拜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會爲了慶祝農曆新年、促進師生感情及交流學術心得，2007 年 2 月 23 日（丁亥年正月初六）於賽馬會師生活動中心舉行新春團拜，有歷史系多位教授、研究生及畢業校友參加，歡聚一堂。

※ 重新認識孫中山學術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文匯報、長春社古物古蹟資源中心聯合主辦的「回歸十年——重新認識孫中山學術講座」，2007 年 3 月 10 日在香港理工大學演講廳舉行，由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院長梁德榮博士致開幕辭，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教科部李育芳副處長致送紀念品。

大會由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區志堅博士主持，包括四個演講：一、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講「孫中山與香港——二十一世紀的再認識」；二、陳成漢先生（香港歷史博物館一級館長）講「孫中山紀念館籌辦與建築藝術」；三、陳捷貴太平紳士（中西區區議會議員）講「簡介中山史蹟徑歷史文化之旅」；四、張景佳小姐（港專旅遊工作坊旅遊顧問）講「從旅遊文化角度看香港一地的中山史蹟」。同日下午並舉辦參觀孫中山紀念館活動。

※ 中國歷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於 2007 年 4 月 17 日及 20 日分別舉辦了兩次中國歷史講座，邀請著名作家陶傑先生主講「魏晉思想隨談」和「中外婦女運動」，講座由黃嫣梨教授主持。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向 ❖

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紀念活動

為了紀念基督教新教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究中心、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研社、基督教文化學會、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共同籌備了一系列活動，於2007年舉行，包括：

(一) 歷史圖片展——4月23日至30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展覽，計有圖片一百八十張。圖片由台灣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提供。

(二) 公開講座——4月25日晚上在九龍旺角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舉行，由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吳梓明教授主持，林治平教授（台灣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李金強教授（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講「我們正在寫歷史」和「馬禮遜牧師來華宣教及其影響」，李志剛牧師（基督教文化學會）回應。

(三) 第五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4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開幕禮，27日續舉行研討，28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續舉行研討會及閉幕禮。研討會分為八節，主題包括：歷史與現狀、馬禮遜研究、人物研究、天主教研究、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傳教史、出版及翻譯、醫療事工、教育事工、女性基督徒、教案 / 地區研究 / 現代基督教、《聖經》研究，宣讀論文六十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向 ❖

學界消息簡報

※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新一屆幹事會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2007-2009 年度幹事會名單已於 2007 年 3 月 15 日召開的幹事會議中通過確認，各職位安排如下：

會長	麥勁生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副會長 (外務)	張偉國博士 (香港公開大學)
副會長 (內務)	李培德博士 (香港大學)
秘書	朱益宜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財政	黃文江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學術	李金強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總務	梁元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繼《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十期之後，該會於 2003 年創辦《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四期已於 2006 年出版。

※ 陶行知研究高層論壇

2007 年 3 月 14 日，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南京曉莊學院聯合舉辦「陶行知研究高層論壇」，有一百一十多位來自全國十四個省、市和地區的學者參加，大會有兩個主題報告：一是華中師範大學董寶良教授的「教育理論創新的泰斗和楷模」，一是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楊東平教授的「中國需要新的教育哲學」。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理事胡國樞、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張行分別主持了上、下午的研討；陶行知的弟子陶城教授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南京曉莊學院陶行知研究所所長徐志輝教授主持閉幕式並這次論壇的研討成果作了總結。

※ 商務印書館公開講座

香港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已於 2007 年 5 月開始營業，6 月 2 日並於展覽廳舉行公開講座，邀請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倪博士主講「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文化教育意義」，作為商務印書館 110 周年館慶活動之一；又於 6 月 5 日舉行「解讀《清明上河圖》講座」，分析《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的緊密關係。

※ 香港歷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嶺南大學、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合辦的「香港歷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6月7日及8日分別在嶺南大學及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議題包括：（一）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歷史狀況；（二）香港與內地的歷史聯繫；（三）香港與中西經濟文化交流。

※ 科大頒授榮譽大學院士予陳萬雄博士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及總裁陳萬雄博士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頒授典禮於2007年6月7日舉行。陳萬雄博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榮譽文學士及哲學碩士學位；在日本廣島大學修畢博士課程，再於香港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著有《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歷史與文化穿梭》，及《中華文明傳真》系列的《中華民族新生的陳痛》。多年來致力於開拓中文出版及推廣文化事業，2003年榮獲香港印製大獎的傑出成就大獎。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Communities, Immigration, and Influence in Modern Asia”

Michael Wing-hin Kam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Communities, Immigration, and Influence in Modern Asia”, organized by th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re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co-sponsored by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was held on 26th May, 2007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irty scholars from China, Hong Kong, Japan and Korea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and twelve papers were delivered.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osted by Professor Frank H. K. Fu, the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Professor Kai-wing Chow, the director of th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re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Cindy Yik-yi Chu, Professor of History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organizer of this conference.

This conference was divided into four sessions. The first session chaired by Professor Pui-tak Le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ffered four papers o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immigrants in Asian countries. The first paper in this session entitled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in East Asia, Beyond the Institution and Rivalry: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was presented by Professor Chen Laixing (University of Hyogo). She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different East Asia countries functioned as an indispensable business infrastructure that linked up and provided support for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Professor Kawashima Shin (University of Tokyo) highlighted in the second paper, “Dialogue between Diplomacy and Immigration: Introduction on *Qiaobao* of Jinmen Island until 1949,” the value of *Qiaobao* compared with other documents in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Jinmen and their mother villages. Contending the view that under the Spanish influence,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 appeared to be a colonial “Other”, Professor Sugaya Nariko (Ehime University) pointed out in her “Chinese Life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The Colonial ‘Others’ or the Spanish “Subject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never isolated by native populations, and that the Christian faith was a means for Chinese immigrants to keep track with the “Spanish Subjects.” In the last paper presented in this session “The First Qing Foreign Mission in

Japan and Their Impression of Japan,” Professor Kai-yin La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iscussed He Ruzhang (何如璋) and Huang Zunxian’s (黃遵憲) impression of Japan.

The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session revolved around the theme “Hong Kong under the mainland influence.” The chairperson of this session, Professor Ricardo K.S. Mak, and both presenters, Professor Cindy Yik-yi Chu and Mr. Yiu-chung Wong, are fro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of. Chu’s paper entitled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showed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reased its influenc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Offi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Hong Kong (八路軍駐香港辦公室),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in Hong Kong (中共香港市委), Hong Kong China News College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etc, all of which we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outhern Bureau (南方局) led by Zhou Enlai (周恩來). Mr. Wong’s paper entitled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Refugee Problem from 1945 to 1962” explained why the Hong Kong colonial government abandoned its non-intervention attitude toward the “refugee problem” and strove to resettle the refugees from the mainland and to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period 1945-1962.

The third session, chaired by Professor Yu-lok Chiu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ered its attention on “Korea and China under foreign influences.” In his paper “A Review of Pak Ũn-sik’s Educational Thought” that kicked off this session, Dr. Wing-chung Fan showed the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entire intellectual spectrum of Pak Ũn-sik, who was an important reformist thinker in modern Korea. Assessing various theories that scholars used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Korea, Professor Bong-jin Kim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exposed in his “An Essay on the Approach of Colonial Modernity to the Korean Colonial Period” the limitations of post-nationalist or post-modernist approaches and called for a thorough reconsideration of the uses of concepts such as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modernity, orientalism, etc in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Korea. Professor Ricardo K. S. Mak’s “German-educated Chine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istik* (German Studie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37” concluded this session. Through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s of German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fforts of Chinese Germanists in this period to widen the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German culture, Professor Mak emphasized that German Studies had not yet grown into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he inter-war years.

The last session of this conference, which was about the Shanghai printing industry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s chaired by Professor Yuen-sang Leu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is “Tribulatio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Graphic Printer’ from 1937 to 1940,” Professor Kishi Toshihiko (Kanagawa University) attempted to complement Christopher A. Reed’s book through examining “the Graphic Printer (藝文印刷月刊),” so as to reveal the entire picture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1930s. In addition to outl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Yazhoushiji*, Professor An-suk Son’s (Kanagawa University) “*Yazhoushiji* (Asian Century, Shanghai, 1947-1949) an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Japan” threw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sher Gaizao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Asian Relations, and *Yazhoushiji*'s reactions to major Sino-Japanese conflicts such as China's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and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In contrast to Professor Toshihiko and Professor Son, Professor Kai-wing Chow provided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Japanese press in modern Shanghai in his "Japanese Journalism in Shanghai, 1882-1945." Editorial principles,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leading Japanese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who were actually involved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ere carefully examined by Professor Chow.

Professor Chu's concluding remarks not only ended this one-day event, but also promised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in the near future.